

教育的

理性与情感

JIAOYU DE
LIXING YU QINGGAN

李盛德 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教育的理性与情感

李盛德 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的理性与情感/李盛德著.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81092-986-8

I. ①教… II. ①李… III. ①教育研究 IV. ①G4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5430 号

教育的理性与情感

李盛德 著

出版发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陕西杨凌杨武路 3 号	邮 编: 712100
电 话	总编室: 029 - 87093105	发行部: 87093302
电子邮箱	press0809@163.com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9	
字 数	139 千字	

ISBN 978-7-81092-986-8

定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序

教育是复杂的,因为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无论从主观到客观、从目的到途径再到对象都是复杂的(即便是有人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但这种认知的过程也是宏观的,而时间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已经让人感到棘手),教育所面对的人是复杂的,他是处于生物链顶端的智慧生命体(尽管儒家认为人是可以教化的,但经验似乎提示我们对其越是尊重,就越会发现其更多的复杂意义与秘密),这意味着教育方法、模式、目标要不断地做出探索、修正,建立良好的教育者的思维以及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正因为教育的复杂,所以教育者必须有一种姿态,那就是尊重,尊重世界的复杂性,尊重面对的对象,在尊重基础上认知,探究解决办法。

教育是纯洁的,因为他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心对心的交流、沟通,心对心的呵护。这决定了教育者必须有一种坦诚、无私、爱心,在对自然、知识的尊重,对复杂性的尊重,对受教育者的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心与心的对话。

教育既充满理性、又渗透着情感,但对理性与情感的边界的把握却需要教育者思索甚至是终生思索,因为很难找到明晰的边界。

教育是重要的,因为它关乎于每个年轻人未来是否能够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决定了教育者必须有一种义务与责任。)

教育是复杂的,而且涉及科学与人文等相互渗透的各个方面。面对复杂的事物的认识,必须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否则就会更多求助于主观。可是,人连自身的秘密还没有搞大清楚,主观的可信度不会太大,需要科学的认知体系与逻辑的帮助。二十世纪中关于复杂性科学探索(普里戈津宣布了确定性的终结)表明,在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复杂的、深刻的矛盾中,在视觉和触觉都得到极大地延伸的情况下,传统上看来可能是孤立的事物,现在却可能呈现出密切联系,为思维、科学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教育,考验着教育者的智慧:如何对待教育工作?如何对待学生?教育者需要什么样的认识、素质、技能、心态?而它的目的是要提高受教育者的智慧,使受教育者得到良好的教育,或者说使受教育者能够成就一次有意义的人生。

古希腊时期,科学、哲学、数学的密切联系,从某种角度说,在深层次上沟通了文化的各个元素的联系,而我们今天似乎有些分离。围绕着教育,C. P. 斯诺曾经提出两种文化的关系,引起争论。笛卡尔说:“我从孩提时代,就接受人文教育,因为有人劝告我,凡是对人生有益的一切事,都要有明白切实的认识。”泰戈尔的一首诗《世界上最远的距离》,给我们描绘了世界上任何两个事物都可能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或许就是世界的复杂性所在。主观上或直观上看是不可能有问题的事物,却可能恰恰是问题所在。于是,非黑即白的思维逻辑有时是会犯错误的,特别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更是如此。努力探究这些联系,对于教育是重要的,因为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无知是万恶之源。”

构成复杂系统的个体也必然是复杂的,对于教育系统来说也是如此。系统的个体是复杂的,个体到整体(细节到整体)的集结、运动、演化方式也是复杂、非线性的,不能简单地用线性的思维来对待。系统从微观到宏观、复杂的运动过程中,个体与个体、局部间的各种形式的且可能具有偶然性的碰撞,是必然的,这是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典型特征。碰撞的结果是新的事物的产生,这是复杂的个体、复杂的局部自身包含的一种积极的、进化的力量促成的,并且这种碰撞在系统的不同深度、不同层面上进行,也构成了创造、创新的引擎。如何利用碰撞的能量,推动创新、创造,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探索就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教育工作的内容或许比以往更加丰富,意义也更重要。从这个角度说,如今的科学和人文的分界如此清晰,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教育工作者在科学与人文明显界限下,对教育的复杂性的认识就必然有欠缺。苏格拉底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有效地引导复杂系统的个体、局部实现有效的交流(碰撞),产生智慧的火花,诞生新的事物?灌输,带来的往往是过度训练,系统个体的进化机制,创造、创新的引擎,或许就有被摧毁的危险。

可以预见,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视觉和触觉不断拓展,认识方法论也在不断更新,于是,对世界认识的深度与广度增加,认识方法将同步进化,而且会不断多元化。于是,教育观念、教育模式也必然不断变化,否则就如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所说:“1800年的美国人想努力教育1900年的美国人,但这样做的结果时常以遭人嘲笑而告终……1900年的美国人想教育2000年的美国人,这种尝试一定会比1800年的国会议员更加盲目。”可是,哪些需要坚持,哪些需要更新、与时俱进,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否则,就会总处于被动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对复杂系统的认识,必须尊重复杂系统,那就应该是虚心地探究复杂系统特性,从科学的角度去认识,找出内在的机制,减少或避免主观臆断;也不能轻易用简单化方法进行简化,化繁为简,因为对于复杂的系统,简单化方法不总是好用的。亚当·斯密在创建古典经济学时,先研究人的道德这个根本的问题,“看不见的手”的提出,充分地尊重了复杂性系统。没有对科学的敬畏、尊重,估计就不可能发现“看不见的手”了。同样,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冯·米塞斯在《经济学中的认识论问题》一书中,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先验的科学,这意味着其自身存在着科学逻辑、规律。海德格尔对古老的存在问题的探究,在变化中寻求真谛。而寻求复杂的教育自身的规律,在亨利·亚当斯看来是更为迫切的永恒的追求。

到了21世纪,信息化、现代化、全球化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特征,对于教育系统也是如此。信息化、现代化、全球化,促使世界这个复杂性系统更加复杂、更加非线性,系统的个体和局部接触、碰撞的机会更多、更频繁,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创新层出不穷。20世纪末的时候,人们时常预测,21世纪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变化,现在看来似乎远远超出预期。在21世纪初期的现在,我们就感到了这种变化似乎有些让人窒息。金融家索罗斯在警告经融危机的风险,科学家史蒂芬·霍金在警告科技将成为人类的威胁。当互联网、大数据在不断地创造神奇的时候,也在不断地挑战着人类道德伦理底线;当机器人、智能化成为社会生活管理的工具、方法的时候,社会的进步确实如人们所追求的,但也出现了若干棘手的问题。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教育系统只会越来越复杂。但无论如何复杂,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结果,对教育的理性、其自身的规律的把握一定是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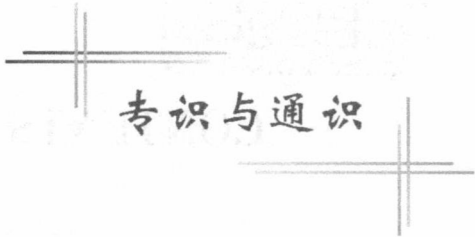
人的心灵是纯洁的、天真的、情感的,但是它是有需求的。这就是进化的引擎。当心灵与现实碰撞,情感和理性就需要调节。尊重科学,就是有效的调节途径。有的人被现实吸收了,有的人可以超越现实,有的人能够在现实与心灵之间游刃有余。而各种人都在解释自己的道理,或许就形成了不同的审美价值观。于是,理性与情感纠结一生,教育如何来协调这个问题呢?

著 者

目 录

CONTENTS

专识与通识	(1)
思维的局限	(8)
线性思维与非线性思维	(14)
科学精神	(22)
理性与情感	(30)
创新的思考	(42)
学生的培养	(51)
生态文明与非生态文明	(59)
木桶效应	(68)
文化自觉	(74)
精益求精——人类一种静穆中追求的情感	(79)
演化从细节开始	(86)
知识与文化的距离	(94)
文明与智慧	(103)
文明与鲁莽	(111)
思维的起点	(120)
主动与被动	(129)
参考文献	(134)
后记	(135)



专识与通识

又送走一届毕业生,照样,不久又将迎来新一级学生。思考一下大学生们的思想、心态、生活背景、文化背景,以及经过学校教育后的思想变化、面对未来的心态变化是很有意义和必要的。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老祖宗早就为后代指明道路,可世事演化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不如意,如果每个人能按照圣人规划出来的路径,也许会少走很多弯路。但从实际看来,人性还是有许多东西需要认识,需要尊重。

中国人是聪明的,我们的学生是也聪明的,一定没错。但是,聪明并不一定等于智慧,也未必等于能够获得智慧,在通往智慧的路上只有聪明肯定是不够的,还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会给予他们的教育环境。父母、老师如何对待教育问题,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文化体系的不稳定就会影响教育体系,就会波及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教育问题,直接后果是几代人的后代不能有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现代的大学生基本属于90后,其父母甚至爷爷、奶奶大多没有受过较好的教育,十年浩劫使他们远离了书本,远离了文化,导致家庭文化教育环境有所欠缺。况且,中国大量的农业人口,决定了家庭环境的文化氛围不能令人满意。恢复高考制度、改革开放以后,小学到中学的学校教育,都是以考试为目的的升学教育,因而,从小学到中学教育环境的文化氛围同样不足。

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竞争环境的恶劣,在心灵的文化滋润需求得不到满足



时,一味、长期的竞争,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导致很多孩子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也不能保证,且随着打工潮,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留守儿童”,更是社会现在或将来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城市化的初期,农民进了城,并没有改变身份,文化环境也无法满足,学生的心灵干渴,并滋生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到了大学,还有很多学生为支付学费而发愁,于是,同样倍受煎熬。学校的教育如何面对这些问题?作为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我们能够为学生做些什么?虽然大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应该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把教育者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做到位。

似乎很多成年人都感觉到现在的孩子有些不懂事,可是,成人就懂事了吗?或许只不过孩子更直接的把一些问题表达了出来,而成年人要固守一些“清规戒律”。那么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如何才能让孩子懂事?回顾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教育,在70年代后期,陈景润曾经激励了一批年轻人,但是这种激励并没有持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性的各个方面逐渐表露,社会的功利性日趋严重,社会的分化、差距越来越大,人性的优点和弱点,似乎都被放大。而学校的教育,除了传授知识、培养技能,余下来,似乎主要做理想教育、意志培养,缺乏个性的人文关怀,或者说,只指出理想的努力方向,而较少地考虑个性差异的强力推进式的教育,不仅影响了培养效果,而且也堵塞了其他个性发展的途径。学校的这种培养方式值得商榷。人,在接受这个世界给予的知识、道理时,一定是通过体验去理解、接受,至于理解、接受的程度,一方面是作为自然人的属性,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属性来进行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的能力,在于个体对知识在现实、历史中的意义的体验、思考、反思、总结的能力,这不是单纯的脱离现实、脱离人性特点的理想教育、意志培养所能达到的,恰恰需要人的思辨能力、对事物认识的水平。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认为的,认识论在中国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因为,那要涉及对事物的追根溯源,这样或许就偏离了功利化的、中庸化的思维,可顾及的功利和平庸又对“求真”的精神构成威胁,演化的结果就是更多的功利主义的盲从,对文明的提升构成阻碍。我们似乎处于一个矛盾的纠结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总是首先从整体利益来考虑行为价值,要求每

个个体要妥协,着眼于未来、理想,而对现实的问题淡化、超脱,形成了统一的成长模式,不仅个性未受到保护,眼前的诸多问题也无法解决,然而,理想与意志的坚持却又往往超越人的忍耐限度,于是,就像有人说的那样,追求目标理想、牺牲掉了过程,这也是一种价值观念。而如果更多地倒在过去理想国的路上,对以前的人或许还没有多少警觉和抵触,但对于接受了现代文化的年轻人来说还愿意接受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而棘手的问题。放弃整体观念谈个体利益,是无政府主义,不可取,至少个体和整体的利益需要兼顾。

现在的年轻人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既有理性又要情感、浪漫,据此,理想、意志教育需要改变,即便是预期的收益,也要判断是否值得消耗精力、体能,这是个体的偏好,个性等生物性使然,也是一个个体与外界相互沟通、妥协的过程。个体的差异性以及社会进化的铁定事实,决定沟通的结果的决定权在于个体本身。于是,在尊重孩子个体行为的基础上,还应注意沟通的方式与内容。沟通方式需要平等、引导、启发;内容上,应涉及专识与通识。特别是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在专识上自不必说,在通识方面要求沟通者具有一定的知识,因为他的言行、观念、思维方式对社会文化起到一定的传播作用。

专识(即便是专识,其通俗化后的一般道理也是通识),其实是一种限定,无须考虑其他,或者需要在一定的基础上、一定范围上接受的专门的知识。专识主要集中于该领域的技术性的知识。通识(通识的范围很广泛,对于活在历史、活在现在、活在未来的不同人群,对于关心宇宙层面、物理层面、生态层面、人文层面、思维心理层面、微观进化层面的不同领域的科学发现的一般道理、朴素的观念,构成庞大的知识与智慧的大厦),则是一种自在的观世界,承载着宇宙一般的道理,自己主动认识世界,形成一种价值观念,苏格拉底的“我知道我无知”揭示了人类智慧大厦的庞大,而由此更应激发出人类的求知欲望。这时的知识是泛指的知识,自然也包括知识之间的联系,但这些智慧包含了自然界一般的道理,不是专识所能替代的。所以笛卡尔说,他在孩提时代就开始接受人文教育,因为有人忠告过他,只要是人生中有意义的事情就必须要有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可是,这清楚的认识从哪里来,还是要自己去认识,这是别人所不能替代

的,这种认识的获得,需要对通识知识的获取以及思想认识方面的实践、体会。而我们似乎没有把这些一般的道理呈现出来,认识的途径也有不畅,本应是自主的体验、分析、判断力的提升,现在却成了不断地强加。专识所起的作用是直接的、联系着利益的;而通识所起的作用是长久的、深远的,决定了一个人走向社会后,思维的宽度。

通识蕴藏着理性的光辉,接受良好的通识教育,人们就会具有良好的思维习惯、正确的思考、自觉的认识、不断地学习,反思就会贯穿于人生思维的每个细节,对历史、现在、未来的事物做出明智的判断。

现实中,接受较好的通识教育的人们,往往可以在许多事情上达成共识,也为专识提供了一种转移的空间,为思维的创新奠定了基础,使大家在诸多问题上给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这也是一种尊重的价值。

通识是通向智慧之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入世文化,人们更多的是生活在现实中,思维更多地是在人的圈子里,于是,就有了有关的媒体批评《甄嬛传》里的比坏心理,因为里面的人物只生存在那个特定的人群中,思维也离不开这个人群,狭义到不能再狭义的地步,所以,比坏的心理产生于那个环境,好人进入之后也难免变成俗人。这就是把目光过度集中、过于狭隘带来的进化效果。进化的原始必须有丰富的进化基因,不然,就是退化的过程,结果是可怕的。

通识的体系过于庞大,在功利化思维的教育体系下进行通识教育是不易实施的。如今高校开设很多通识教育课程,但效果未必很好,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教师的选题、课程建设的质量原因(这个原因随着课程建设的进程,可以弥补);二是学生学习压力造成通识课程被边缘化,甚至形同虚设;三是长期圈养式的趋同化培养,求知的兴趣不足;四是某种原因造成一些课程内容狭窄而无法深入;五是通识教育是长时间,从小学到大学各个时期连续的任务,目前的欠缺应该是从小学开始的。更关键一点是求真精神、科学精神的缺失,带来对通识教育的整体漠视。

专识教育与通识教育应该是相得益彰的,近代科学的发展主要的是西方智者的贡献,这与西方对通识的理解是有关系的。不可否认,中国智慧中,科学的

成分、对自然的审视与剖析似乎在细节上没有做到透彻。而这一点恐怕要反思传统文化中的求真精神、科学精神的不足。

通识教育在于求真教育,培养科学精神的教育同时,又是培养具有广阔胸襟、豁达的情怀的途径,是避免学生的思维世俗化的有效方法。通识教育的发展,瓶颈就在于教育必须对学生的兴趣、个性加以保护,而且必须从教育体系过程中做到体现,这不是其中一个环节的问题,而是整体的问题,应贯穿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过程。按目前的状况,不太容易实现,致使学生的思维局限在有限的知识领域,缺乏研究、创新的基础。

由于当今社会以及文化更多地关注现实、关注利益而带来空前的紧张、压力,因而很多学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加上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增加,教育的思维、观念,方式、方法更多地助长了这种紧张的情绪,使得学生思维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人为造成更多的包袱、压力,接受困难的冲击能力变得脆弱。实际上是注意力过于集中而产生的自然紧张,并且淹没了其他方面的耐力造成的,这也是学校培养单一化思维,造成思维趋同化的结果。然而,我们的教育者还没有警觉,没有意识到创建优良的通识教育的环境,会逐渐克服这些问题,提高学生培养的质量。

求知、求真、追求科学精神,对青年学生本是非常有感召力的,即便是在过重的世俗观念里,这种感召力也会体现出来。然而,我们的教育文化环境不适宜,或者说通识教育环境不健全,抑制了青少年这种潜能的发掘,这一点,社会文化环境是负有责任的。我们似乎更多地沉浸在优厚的传统文化之中,或许会影响我们文化的更新、进步,面向世界、理解世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思维。当然,不是否认自己的文化,只是更好地实现文化自觉,促使文明层次进一步提升。影视剧中的韩流、美剧,之所以赢得了许多国人的赞赏,一定有其道理。社会需要有一个与人类生活相适应的环境,其审美价值观一定要在世俗的基础上提升,社会最起码应具有雅俗共赏的能力。雅,促使人向上追求;俗,使人不时地认识自己。追求真、善、美,能成为社会行为的理性准则,从而能够唤醒理性与情感、道德与友爱的真正力量。作为和谐社会的象征,人们反思能力的加强,



社会、文化自觉的能力提升,每个个体才能够更多地审视自己的行为,唤醒内心的良知。和谐应该意味着每个人的自觉而不是被和谐(整体的目标与个体的需求一致,个体的需求来自于个体的思维的自觉,这应该是通识教育的效果)。

生存需要道德,理性需要情感,理性的提升,会带来情感的愉悦,情感的愉悦,会带来生活的激情,进而促使理性进一步的提升,理性的提升带来思维的智慧。生存与道德是生态基础的维系,生存作为生物存在的底线,是基础;道德是文明社会个体行为的底线。理性与情感是高一层次的范畴,是在生存与道德有必要保障的基础上,通过思辨、体验、总结来提升生存的质量。而无论理性与情感、生存与道德,都是基于个体生存过程的思维与行为的活动来实现,这些社会思维与行为关系,是需要通识教育才能够理清的。

通识教育通常是讲大道理的,可是,在功利主义的框架里,人们似乎又有另一种倾向,拒绝大道理,认为大道理大多是空谈,这或许也是通识教育不能被重视的原因。威廉·詹姆士在他的著作《实用主义》中有一段话很值得回味:“一个教授所相信的不论是什么样的宇宙,无论如何,总是要做长篇论述的,一个宇宙如果用两句话就能定义,那就用不着教授那样的智力了,那样浅薄的东西是不会得到人们信仰的,我听说,在这个大厅里,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争论着要使哲学通俗化,但他们很快就讲得枯燥无味,然后,变成专门的东西,结果只是差强人意而已。”这里包含了几个深刻的道理,首先,世界的任何局部是演化而来,都有丰富的值得探索的内容,从认识论的角度,都有认识的价值,甚至是潜在的价值;其次,必须相信知识的力量与价值;简单化、目标化、通俗化是达到适用目标的一种途径,并不一定是求知的途径;最后,一味地简单化、目标化、通俗化,从思维上讲或许更多的是退化,认识论的途径是多维的。因此,对通识教育的意义是需要清晰的。认识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是重要的,科学精神的培养,探索、反思精神的培养同样重要。

乔布斯曾说:“我愿意用我的全部财产换来和苏格拉底一起呆一个下午”,可见苏氏的思维在乔布斯心中的重要性。事实上,对社会、历史、经济、人文、艺术、科学发展的历史以及成果的一般性的思维方式、方法的每一次体会,都会有

不同的收获,而这种体会,是通识教育的结果。

多年以前,中国提出要建立学习型社会,从社会文化环境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学习型社会需要一个尊重人文的环境,要求文化自觉,宏观上又能对社会文化新陈代谢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不能一切都为了利益的目标。

成功的教育必须具有协调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情感、个性与整体的关系的教育文化环境。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基本上是一种理想教育加科学教育,专识方面不断地加强,通识方面却存在明显的不足,无法做到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情感、个性与整体的结合教育,而且在改革逐渐走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下,社会底层民众的文化素质越来越无法保障,教育就面临更多的问题,大众整体文化素质就会弱化,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总的来说,学生在小学、初中、高中疲于应付各种考试,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踏上了漫长的考试之路(不能坚持的或被功利化冲击的很多连义务教育部分都坚持不了而辍学),但是在心灵的哺育方面,更多是空白。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家庭环境,进行心灵的安抚还能好些,但毕竟家庭环境文化气息不足,学校也没有更多的营养来滋润心灵,在功利的社会环境里,许多学生就迷失了方向。

通识中的智慧是思辨的智慧,是以真理的探究为目的的,不以利益为价值标准,它着眼于认识自然的本质,一般依赖于文明程度提高后,个体的文化自觉。

大环境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一届一届的学生走进走出校门,也是不容许我们等待的。作为教师,我们首先必须有清晰的认识,传递给学生一个明确、清晰的观念,不断提高综合素质、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对学生的心态、个性进行有效的把握,采用科学的教育内容、手段、方式、方法,而不是一味地抱怨学生。



思维的局限

任何一种思维都会或多或少有其局限性,要突破这种局限,需要文明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更需要时间的锤炼。

英国哲学家罗素(数理逻辑创始人)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写道:“毕达哥拉斯,是自有生民以来在思想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数学,在证明式的演绎推论的意义上的数学是从他开始的,而且,数学在他的思想中,是与一种特殊意义的神秘主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自他以来,而且一部分是由于他的缘故,数学对哲学的影响一直都是既深刻而又不幸的。”这里所指的“深刻”,我们似乎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可是,这里的“不幸”又是从何说起呢?著名哲学家这样的评论,一定蕴含着深意。当人们思维受单一的意识控制时,思维的创新被严格的逻辑奴役,即便是科学,当其相对性、狭义的理性充分显现并起到控制作用之时,或许也会是如此。数学,在一般人看来,有一种神秘、敬畏之感,但神秘、敬畏成分越多,说明它与现实偏差越大,达到它的途径越不平坦或者说不是通常的途径,其实,还必然包含形而上的成分。而“不幸”,应该是体现在它间接或直接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对思维观念的影响,这似乎就必须要考虑,一种科学的思维如何与社会结合、与社会对话。我们绝对不可小视这种对话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这种影响甚至产生不同的发酵式的效应。

数学,特别是演绎逻辑意义上的数学给哲学带来严密性的逻辑基础,在哲学中增加了晦涩,甚至也增加了些许神秘的色彩,从而在形而上途径上获得了

发展,尽管它能够实现与实用、经验主义哲学的平衡,但却无法排除它乌托邦式的影响。在社会文化环境优越的氛围中,促进文明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是受文化思想的指引和科学发展所推动的,构成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但这种指引和推动的过程都是遭遇性的,特别是在掺杂着各种利益的角逐下,有时是让社会来不及反应的,后果可能远远背离思想者的愿望,当文化环境成熟一些,个体文化素质好一些,社会就可能平稳一些。

数学科学、自然科学,更多地关注于它的求“真”,而现实哲学思考或人文科学的出发点更多地关注的是求“善”和“美”,至少是“真”、“善”、“美”的结合、平衡。如何使其在各个方面相互促进,是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任何有影响的思想和知识,一定有深厚的背景,会吸收方方面面的营养来丰富自身,才形成生命力,但在其形成并独立发展之时,却可能走入自我的否定。亚当·斯密时期,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学里还没有一门独立的经济学课程,而亚当·斯密教授过逻辑学、道德哲学(当然还有艾萨克·牛顿的科学精神的激励)从而找到了经济学的根基,以至于他所创造的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时至现在依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实,亚当·斯密正是由于扎根广博的肥田沃土,领会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从社会的人性出发,从道德理性出发,才成就了《国富论》(我们更不能忘记的是,《国富论》的基础是《道德情操论》,如何提高道德伦理情操的水准,那应该基于对人性的认识论的研究,也是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或许,正是这一点才使得他发现了“看不见的手”可这在当时牛顿的科学体系起到统治地位的土壤里,能够挖掘出进化论的思想是多么的不易。亚当·斯密关注人的道德伦理情操,而高尚的道德伦理情操来自优越的人文文化,在高尚的道德伦理情操基础上论经济、论国富。当这个基础不稳固了,自然无法论及相应的结果。如今科学发展了,数学也发展了,但赖以生存的经济学的基础,道德情操出现了问题,经济就更多地充满投机。当经济学脱离对人性的认识的基础而单纯走入形而上的途径时,经济学的发声或许就很苍白。

社会科学根植于社会,在社会的沃土里汲取营养,而形而上学有时是纯思维、逻辑的产物,互相启发可以,但似乎不能互相代替。形而上学的逻辑,作为



逻辑,比社会的逻辑还是显得不那么丰满,但社会的逻辑的认识是建立在对社会的尊重,对组成社会的细胞、组织、结构的尊重、认识的基础上的。

古希腊人在哲学、数学、天文学上的贡献,经过古罗马和阿拉伯人的交替演进,到十六、十七世纪,哲学、科学数学的发展又达到了一个顶峰,哲学上自笛卡尔的贡献开始,科学上自哥白尼的革命到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数学上以牛顿的微积分为代表,均以确定性思维占统治地位,甚至妨碍着思维的进步。“极限”概念在数学中的位置愈来愈重要,不是以前人们意料所及,全部的微分与积分,实在说起来,几乎高等数学中的每个东西都依赖于极限这个概念,以它为基础。”^①因为极限方法达到了由宏观到微观的分解、整合,从微观到宏观的积累、过渡,而一旦涉及的对象实现不了这种过渡,极限方法就不适用于该对象(实际中确实有这样的反例,原来数学家们认为这只是极个别的特殊情况,可科学的发展表明并不是这样)。微积分研究的东西基本都是从宏观到微观的组织,具有某种一致性,通过细分的思维加上极限的手段就可以实现从微观到宏观、从宏观到微观的过渡而解决这些问题,很遗憾,对于人类社会恰恰有很多不满足这个原则。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生物系统是不能够通过宏观自上而下的思维实现有效控制的,而我们如果相信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就等于接受了经济领域也是不能完全由人工自上而下控制的,而你要是 不信,也有诸多现成的事例否定你。于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时,李克强总理开始发出壮士断腕的豪言,决心把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表明:经济系统的宏观和微观也不存在这种适用于极限方法的一致性。简单地处之,只能破坏系统的运行效果。

数学的基础是集合论,推理的基础是逻辑,如此说来,形而上学的味道很重,数的集合与欧几里得几何是数学的经典、基础。在这里可分的概念是清晰的,在可分的意义上是表里合一的,有限和无限是统一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地位是平等的、同性的,维数是有限的。即便是模糊数学也通过隶属函数而遵从经

① [英]伯特兰·罗素.数理哲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93。